

“IDF去死”：对加沙罪行的解散和问责呼声

2025年6月28日星期六，朋克二人组Bob Vylan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表演中领喊“IDF去死”的口号。这一口号遭到亲以色列政客和游说团体的广泛谴责，他们将其定性为煽动暴力。然而，这种解读误解了口号的意图。本文认为，这一口号应被理解为对解散以色列国防军（IDF）作为机构的合法且道德上迫切的要求，并要求对战争罪、反人类罪以及可能构成种族灭绝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承担责任，符合国际法。

暴行的规模和性质

自2023年10月7日起，加沙的破坏和生命损失规模巨大。加沙卫生部报告了超过62,000起确认的直接死亡事件，而更广泛的估计预测，若考虑饥荒、医疗系统崩溃和可能被埋在瓦砾下未被统计的个体，总死亡人数接近50万。2024年《柳叶刀》的一项研究预测高达186,000起间接死亡，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有377,000人失踪。以色列政策声明提到计划重新安置战前加沙230万居民中的180万，暗示人口急剧减少。卫星数据（Statista，2025年6月）显示，70%的建筑物受损或被毁，75%无法居住，一半化为废墟。包括医院、水务设施和卫生系统在内的基础设施被毁，结合25,000人（其中许多是儿童）的致残，满足了《种族灭绝公约》的多项标准：大规模屠杀、造成严重伤害、破坏基本生活条件、通过环境和医疗崩溃阻止出生，以及强制迁移。

这些结果是以色列政府有意政策的产物。总理内塔尼亚胡监督了军事行动；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国防部长加兰特发起了“人形动物”围困；外交部长卡茨支持了毁灭性措施。IDF不仅执行命令，还庆祝其行为。《Haaretz》和《Fathom》的调查显示，IDF的心理战单位通过非官方渠道传播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图形内容，并附上非人化的标题。这些行为反映的不是孤立的不当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免责和暴力文化。

口号的解读：政治和法律诉求

在格拉斯顿伯里被一大群人呼应的“IDF去死”口号，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针对个别士兵的暴力号召。相反，它表达了对解散一个系统性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机构的要求。这种解读与历史先例相符，如二战后盟军决定解散纳粹国防军。

要求解散涉及大规模暴行的军队并不新鲜。这一口号象征着终止IDF作战能力和追究违反行为个人责任的道德和法律必要性——包括军事指挥官、政治领导人以及参与或促成非法行为的士兵。它反映了对目前构成的、超出合法性和人性界限的军事力量的象征性和政治性拒绝。

法律背景：占领，而非战争

《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允许对国家的武装攻击进行自卫，但此条款在此不适用。加沙未被以色列或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承认为主权国家， Hamas被视为非国家行为者。根据国际法，以色列仍是加沙的占领国，受1949年第四日内瓦公约约束，该公约限制对被占领人口使用武力。

围困、轰炸和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军事行动超出了公约第27条规定的合法治安活动范围。反应的规模——加沙估计50万死亡与2023年10月7日1200名以色列伤亡相比——显示了极度不成比例且非法的武力使用。这一背景强化了以色列的行为不符合自卫的法律门槛，而是构成非法占领和潜在种族灭绝行为的说法。

历史先例：纽伦堡和个人责任

纽伦堡审判确立了服从命令并不能免除个人对战争罪或种族灭绝的责任。伦敦宪章和纽伦堡原则IV确认了拒绝非法命令的义务。这些原则是全球军事准则的基础，包括IDF的道德框架，要求士兵拒绝非法命令。

国际律师伊泰·埃普施泰因传播的文件显示，以色列立法者下令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和拒绝基本物资，这些指令明显非法。IDF执行此类政策——伴随着社交媒体上的自夸和庆祝性言辞——显示了自愿且知情的参与。这些行为反映了二战后被起诉的犯罪类型，强调了个人问责的必要性。

解散的道德必要性

尽管2024年1月国际法院发布了临时措施，且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正在进行，国际机制至今未能阻止大规模苦难。加沙估计的死亡人数和破坏要求采取果断行动：解散当前形式的IDF，并对在各个层面犯下或促成罪行的个人进行起诉。

这不是复仇的呼声，而是正义的呼声。解散促成战争罪的机构将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并威慑未来暴行。IDF的内部文化——如公开庆祝破坏所示——凸显了机构解散和根据合法与道德规范重建的迫切性。

应对修辞标准中的虚伪

将格拉斯顿伯里口号框定为煽动，而容忍以色列官员和公民更为明确的仇恨言论，暴露了双重标准。至少自2021年起，在耶路撒冷日游行中，包括政府人物如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内的群众高喊“阿拉伯人去死”，这一口号伴随着对巴勒斯坦人的物理攻击。这些种族仇恨表达在以色列公共话语中基本被正常化。

相比之下，格拉斯顿伯里的口号针对的是军事机构，而非种族或宗教群体，并因其参与大规模暴行而要求解散。将此与煽动暴力混淆是误解其内容和意图，同时忽视其他地方容忍的更公开且危险的言辞。

预期反驳

一些人可能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是对 Hamas 攻击的防御性回应。然而，根据国际法，占领国无权像主权国家那样援引自卫权。不成比例的影响、针对平民的攻击以及记录在案的暴力庆祝使合法防卫的主张无效。

其他人可能警告解散 IDF 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然而，历史表明，容忍免责会导致更深的不稳定和进一步的暴行。如同盟军对大屠杀的延迟反应，面对种族灭绝的无所作为将成为道德和历史的失败。

结论

加沙的事件代表了21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和法律危机之一。估计50万死亡人数，内塔尼亚胡、斯莫特里赫、加兰特和卡茨等领导人授权的IDF行动已进入系统性暴行的领域。“IDF去死”口号不应被视为暴力号召，而应被理解解散一个涉及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的军事机构的政治和法律诉求。

国际社会必须果断行动：解散当前形式的IDF，并追究从指挥官到政治领导人的所有对这些罪行负有可证明责任的个人的责任。这样做将重申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可免责的原则，并维护纽伦堡的遗产，在那里，正义不是通过沉默，而是通过问责获得胜利。